

“绿色”辨义：从感性直观到知性分析再到理性综合

黄志斌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9)

摘要: 本文从视觉、联觉、象征三个方面论述了“绿色”的感性直观的含义:蓬勃的生机、旺盛的活力、绵延的生命;从优先考虑环境属性的角度阐明了“绿色”的知性分析的含义:节约、回用、循环;并在感性直观、知性分析含义的基础上,厘清了“绿色”的哲学意蕴:生生、协变、臻善。

关键词: 绿色;感性直观;知性分析;理性综合

中图分类号: A849;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3)03 - 0016 - 04

当今世界所显示出的绿色趋势和生态觉悟,已使“绿色”成为科技、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及其有关学科广泛使用的概念和限定词,但不同领域和学科使用“绿色”时,所取含义是有所区别的,有的甚至是大不相同的,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意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运用系统辩证的方法,从感性直观、知性分析、理性综合三个方面辨析“绿色”的含义,以裨益于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创新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深入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人的认识可以划分为感性直观、知性分析和理性综合三个层次。感性直观是指主体通过感官所直接感知到的客体现象,它是人类认识的起点,结果形成关于客体之“生动的表象”。在感性直观中,“绿色”之最简单的形态是视觉性的。马克思说:“色彩的感觉是美感最普及的形式。”^[1]人的色彩感觉特别敏感,任何客观事物不管它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对人最先激起的感受就是色彩感觉。绿色是生命形态、生态系统的主色调,青山碧水,绿叶红花,风起松涛,雨打芭蕉,蜂飞蝶舞,虎啸猿啼,它们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通过诸分析器的作用便形成关于“绿色”的生动表象,生命的搏动,自然的生机跃然脑中。

但人的视觉与人的其他感知觉一样,往往不是纯感性的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知识经验的介入和其他认识能力的参与。如果主体因其知识经验的介入,记忆和想象的参与而产生关于绿色的联想感受,那么这种感性直观中的“绿色”就是联觉性的了。在人的各种感觉中,色觉的联觉效应最为

凸显,它所兼有的冷暖觉、离合感等等已为心理学所确证。红、橙、黄等颜色往往使人联想到太阳和烈火,具有热情奔放、刺激感强的特点,使人产生温暖感,故称暖色;青、蓝、紫等颜色往往使人联想到碧空和寒水,具有安静、稳重、凉爽的特点,使人产生寒冷感,故称为冷色。暖色有离心扩张,逼近观众的感觉,冷色有向心收缩,离开观众向后退缩的感觉。黄色和蓝色的等量调和则产生绿色,因此绿色是中性色调,在其所产生的联觉中,冷与暖、离与合(退与进)两极获得了统一,达成了和谐,使人于平静之中感受着黄和蓝的暂时被束缚起来的潜在活动性。^[2]联觉性的“绿色”既表现出高度的宁静与和谐,又潜蕴着旺盛的活力。

而且,人们都“生活在来自过去的事物之中”,^[3]故主体在直观客体时难免要受到文化传统、民族习惯、思维方式的影响。如果因为文化传统、民族习惯、思维方式的介入而产生关于“绿色”的文化感受,那么这种感性直观中的“绿色”就具有了象征意义。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是大片大片的黄土地哺育了中华儿女。这种文化的积淀造成了中国人对黄色的崇尚,从黄土地到金黄的庄稼,从黄皮肤到黄冠、黄袍,从远古的黄帝到历朝的皇帝(皇黄同音通假),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文化则发源于古希腊的爱琴海滨,是蔚兰色的大海哺育了古希腊人,蓝海与西方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蓝海再加上阳光(特别是朝霞、晚霞)照射,便折射出紫外线,形成大海深处的紫色。因此,蓝与紫是西方人特别尊崇的两种色调,如在罗马帝国,皇帝的专用服色就是紫色的。概言之,黄色在中国人眼里是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是黄土文明及其恋土情绪的体现,蓝色在西方人眼里是神圣

【收稿日期】 2002 - 08 - 30

【作者简介】 黄志斌(1958—),男,江苏如皋人,东南大学哲科系博士生,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教授。

和高贵的象征,是蓝海文明及其亲水情结的体现。绿色乃蓝色与黄色的调和,故感性直观中的“绿色”象征着蓝海文明与黄土文明的相容互补,象征着理解、和平与美好,象征着在水与土互渗结合中化育出的生命的绵延不息。

将感性直观中关于“绿色”的视觉性、联觉性、象征性认识综合起来,其含义就是:蓬勃的生机,旺盛的活力,绵延的生命。但这种感性直观的认识只是一种生动的表象,具有直接性、经验性的特点和表面性、外在性的局限,未能深入绿色世界的内部,揭示绿色的本质。

二

20世纪70年代掀起的“绿色运动”,使绿色科技应运而生,迄今已初步形成以生态科学为理论依据,涵括绿色设计、绿色工艺与农艺、绿色产品诸环节的绿色科技体系。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先生1995年就撰文,提出要顺应绿色大趋势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潮流,将“绿色科技纳入我国科技发展总体规划中”。^[4]从认识论角度看,科学技术的中心任务就是对感性对象进行知性分析,否定“生动的表象”之外部、次要、派生的属性和联系,抓住其内部、主要、基本的属性和联系,提取出“抽象的规定”,形成知性概念(Conception)或规律性认识,并在实践中予以应用和确证。相应地,绿色科技在本质上就是要分析出感性直观中“绿色”之“抽象的规定”,揭示“绿色”的本质和规律,并付诸实践。

综观以生态科学为理论依据,涵括绿色设计、绿色工艺或农艺、绿色产品诸环节的绿色科技,其中各学科尽管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法、手段各异,但在本质上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基于“绿色”的生动直观,把“环境属性”置于优先考虑和分析的地位,形成了三大“抽象的规定”,并加以应用,这就是Reduce(节约)、Reuse(回用)、Recycle(循环)。

“绿色”首先是节约(Reduce)的。节约有两层意思,一是省料,二是节能。从绿色的生命、生态系统原本身分析,它们经过亿万年的演进,其结构及要素之于相应的功能往往是非常“经济”的。蛇之“热眼”、王莲之叶、蝗虫之腿等等,概莫能外。特别要指出的是生物多样性的“多”不是多余,而正是“节约”,这个“多”是维持生态系统特定功能的需要,正因为这个“多”的存在,才使生态系统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去向,显现出充分的“经济性”,“由一种有机物排泻出来的被当做废物的那种东西都会被另一种有机物当作食物而吸收”。^[5]因此破坏这种多样性,就会降低甚至会瓦解生态系统特定的优异功能。

从技术发展角度分析,绿色技术属节约型技术,它要与生命、生态系统一样,具有充分利用物能、节省资源的功能,因此也可以说是仿生型技术,其成果主要是生命、生态系统模型的实现。较简单的仿生是功能模拟,它只谋求技术与生物体“节约”功能的相似,而不必要求结构的相同,如北极熊仿生住宅、王莲型体育馆大厅屋顶等就属此类。其客观依据是自然事物的异构同功原理。大千世界中不同结构的自然事物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具有相似甚或相同的功能,生物界也是如此,故人们在未搞清或难以搞清生物体结构的情况

下,可着眼于运用模型来再现作为原型的生物所具有的某些功能,而不必究活生物的具体物质结构、物质成分和这些复杂过程的内在关系。但很显然,生物体结构形态的高度合理性,决定了技术模型难以完全再现生物体原型优异的“节约”功能,而且非生命形态的结构也必然会限制其功能的完善,人们欲完备地再现生物体原型的“节约”功能,就必须进行结构仿生。现在人们对人工神经网络计算机的研究就属于结构仿生,它所追求的是计算机与人脑的结构相似,功能逼近。

“绿色”的第二个规定是回用或重新使用(Reuse)。回用即对资源的再利用。生命、生态系统的这种特性是非常突出的,其客观依据在于自然系统层次结合度的递减原理。美国系统理论专家E.拉兹洛曾明确指出:“当我们从初级组织层次的微观系统走向较高层次的宏观系统,我们就是从被强有力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系统走向具有较微弱和较灵活的结合能量的系统。”^[6]这就是说,在一个个层次结构中,随着层次由低到高的推进,系统的结合度呈递减趋势。将夸克结合为基本粒子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将质子和中子结合为原子核的强相互作用就弱了一些,将原子核与电子结合为原子的电磁相互作用力又弱了一些,将有机小分子结合为生命大分子的肽键、氢键又再弱一些,细胞器之间、细胞之间、组织之间、肌体系统之间结合的紧密程度依次更加弱化,至于维持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力量则与物理和生物化学的力量就难以相比了。于是,当自然界的高层系统解体时,下层系统仍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条件下,这“零部件”又可结合成或纳入到新的高层系统,如动物尸体腐烂降解后即可作为植物的养料而又合成有机物。有鉴于此,在资源紧缺的今天,技术品须具有“绿色”的回用规定性,进而要求技术品遵循自然系统包括生命、生态系统的结合度递减原理,满足技术品回用所需要的可拆卸性(类似生态系统中的降解)前提。

“绿色”的第三个规定是循环(Recycle)。生态科学分析表明,循环就是生态系统中某些物质形态和能量形式的重复出现和周期性变化。老子说,“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7]意思是说,不停地循环进行,可算作天下万物的根本,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开放的闭路循环系统,其中的自养者、草食者、肉食者、腐生者正好构成了一个“生产—消费—复原”的闭合链条,实现着生态系统物质能量的高效循环利用。而人类近现代工业社会形成的生产模式却是“原料—产品—废料”的断裂链条。人类生产投放的物能只有一部分(而且常常是很少一部分)转化为产品,其他部分则作为“三废”投向自然环境,造成污染。所以,人类应该师法自然生态系统,按照循环原理,补上“废料—原料”这段链条,形成“原料—产品—废料—原料”的闭合链条,从而节能降耗,减少污染,将生产和生活系统整合到生态系统大循环之中。^[8]因此,绿色科技的另一重要思路和要求就是把生产和生活系统融入生态系统这一闭环,形成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这也正是人们将绿色科技叫做循环科技,把绿色经济叫做循环经济的原因所在。从方法角度讲,这实际上是绿色科技必不可少的生态模拟法。生态模拟法可视为生态系统层次的仿生,它显然有别于前述生物个体层次的仿生。目前绿色包装的

研发就是典型的生态模拟。

三

节约、回用、循环已经突破了“绿色”的生动表象,触及到了“绿色”的本质规定,但它毕竟是实证科学、应用技术的研究成果,科学技术所固有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它还不可能把握“绿色”的辩证本性。“绿色”的哲学意蕴必须在突破知性分析后的理性综合中才能真正理解和证认。从横向方面看,必须进行外延突破,将“绿色”的意义从生态拓展到人态和心态。广义的生态系统是包括人在内的,人自身内在诸心理因素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也当形成合理结构,显现优异功能。生态所及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态所及主要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心态所及主要是人自身的关系,在哲学的层面上,这三大关系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一以贯之,统一研究,对“绿色”必须做生态、人态、心态的全面理解。从纵向上看,必须进行意义的提炼、升华与贯通,形成“辩证概念”(Begriff)。辩证概念是直接性与间接性、抽象性与具体性、存在性与过程性的统一,是多种规定性相统一的“思维中的具体”,是对“抽象的规定”的否定和对“生动的表象”的否定之否定。于此,“绿色”的三大规定有机关联,推移过度,并与其视觉、联想、象征意义相融通,昭示出“绿色”之深层本质和辩证本性:生生、协变、臻善。

“绿色”即生生。“生生”回答了“绿色”的存在状态问题。前一个生即生长、生育意,是动词,后一个生即生命意,是名词。“生生”意在状述一种生机不断涌现、活力不断进发的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的结构特征是多种要素的有机关联。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调节、相互成就便产生“生命”,形成“生态”,显现“绿色”。自然生态在蓝与黄的调和,土与水的结合,多种无机有机因子的高度关联,多样生物的共生互动中而“生生”。人态在蓝海文明与黄土文明的相容互补,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合作竞争、理解宽容、和平共处中而“生生”。心态在人自身知情意的协调,真善美的统一,“无有潜”(无意识、有意识、潜意识)的合中而“生生”。另一方面,“生生”的功能属性是生机盎然,活力旺盛,这包括三个基本要求:要素活力适度显现,要素功能高度耦合,系统整体活力旺盛。其中,要素的活力是前提,要素毫无生机固然不行,要素活力显现不足或过度也不行,“不足”与“过度”都会成为整体活力功能的障碍。要素功能的耦合是关键,它由要素结构的关联程度所决定,关联程度越高,功能耦合就紧密,系统效应就越显著。整体活力是归宿,“生生”功能属性的确定须以整体活力的质和量为依据。西方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奈斯曾提出:“最大化的自我实现意味着所有生命的最大的展现”,^[9]而非某个物种的过盛,也非人对他的物的绝对主宰。“人获得了解放,除了个人的意志没有任何其他的标准”,^[10]这既是近代西方文明及其所派生的“自我实现”理念的进步所在,也是它的误区所在。肯定个体或要素活力的现实性是有进步意义的,整体活力正是个体活力适度显现的结果,那种扼杀个体或要素活力的整体实质上是没有生机

的虚幻整体。但把个人意志作为唯一标准,内在于个人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显然会使人误入歧途,去片面追求个体或要素活力的旺盛,结果在个体或要素之间产生严重内耗,最终导致整体活力下降。这就是说,个体或要素“生生”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必须在整体的“生生”中才能确证。另一方面,“生生”的时间特征是“创进不已”。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方东美认为,“根据中国哲学,整个宇宙乃是由一以贯之的生命之流的旁通统贯。”^[11]宇宙间充满了生命的“发育创造”,“而人则是这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12]在这里,将普遍生命视为宇宙本体显然是一种“生命本体论”,不尽合理,但认为生命(包括人)内在于否定当下存在状态的创造性冲动,并可通过这种创造不断演进,又是可取之处的。“生生”之“绿色”绝不是一现即止,而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不断的分合循环中化育生命,螺旋上升。有机关联、活力旺盛、创进不已乃“生生”在结构、功能、时间诸方面的具体展开,反映了“绿色”的深层本质。

“绿色”即协变。协变回答了“绿色”的发展机制问题。协变即协同演进。“绿色”既是生命、生态系统适应环境的结果,也是其适应能力的表征。大地失去了绿,将是一派荒凉,意味着生态危机的出现;人间失去了绿,将是一片冷漠,意味着人态危机的产生;人心失去了绿,将是一腔乖戾,意味着心态危机的萌发。绿色生命乃是一个自足的机体。自足就是动态平衡,作为生命力体现的机体自我生长能力的实现,就是生命体之动态的平衡,生命力的客观现实性决定了绿色生命自足性的必然性。但绿色生命的自足乃是开放的自足,是在与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中的自足。而且,生命力由于绿色生命内在的遗传与变异的矛盾运动以及要素之间的健康互动,则进一步体现为生命自我否定即发展变化的自足。这种发展变化的自足也是开放的自足,它须在与环境的契合中获得现实性。绿色生命若不能从环境中获得“负熵”,通过内化机制转变成机体的组成部分,使机体对环境表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其结果必定是“绿色”的褪去,何言生命的发展和创进不已。扩大到生态、人态、心态,发展变化也遵循协变机制,都是系统与环境的协同演进。协同演进不一定是同步变化,也可以环境变化在先,系统的适应性变化在后,还可以系统自身的变化在先,环境改变在后。在人态与心态系统,由于人之反应能动性、活动目的性、组织社会性的“自适应”作用,可以在改造环境中谋求人自身及其所参与的组织的发展,在实践中实现人改变环境和环境改变人的协同。这样的协变显然是系统自身诸要素与特定环境诸因子作特殊耦合的结果,因此协变之“绿色”总是具体的。

“绿色”即臻善。臻善回答了“绿色”的价值趋向问题。“绿色”是生命体生机蓬勃、活力旺盛的标识。“绿色”生命体不仅护卫着自己的身体,增加着自己的同类,而且内在于使自己的“种族”更加完善的演化趋向。于此,“绿色”生命体既从工具利用的角度来评判其他生命体和地球资源,也从内在的角度来评价其他生命形式的完善性,既受到环境和其他生命体的选择,也选择环境和其他生命体,从而“创进不已”,在显现自然价值的同时创生新的自然价值,使自然价值朝递增

的方向演进。

把“绿色”生命体放到生态系统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也更容易说明向上的价值趋向。生态系统不仅维持着其中各物种的存续促进各物种生命形式的完美,而且内在于产生新的物种种类,并使新、老物种和睦相处的趋向。因此,“绿色”的生态系统是一个不断演进着的网状组织,其中各物种互为目的与工具,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彼此交织与互动,形成一个功能整体。在这个功能整体中,“内在价值恰似波动中的粒子,而工具价值亦如由粒子组成的波动”,^[14]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融合为充满创造性的“系统价值”,使得自己朝着更加美丽、多样化、和谐、复杂的方向演进。实现着自然价值的递增。

具有创造性的人是自然生命与生态长期价值创造的最高成就。人的主体性特质,使价值尤其是内在价值从潜在转变为现实,人的社会性特质,使自然价值的递增突变为社会价值的创造。但现实的社会价值的创造仍须以潜在的自然价值为条件,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基础在于自然价值的增殖。故对人类而言其“系统价值”乃是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若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严重破坏了自然价值,则这种创造在总体上就不是“善”的创造,而可能是“恶”的创造。“绿色”的价值趋向应当是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协同增殖(这实际上就是绿色科技“3R”的深层本质)。进而言之,人既是创造主体,责任主体,也是享用主体,社会价值的最终实现必须落实到人的具体幸福体验,而且要趋向于使越来越多的人享有更高品质的幸福体验,臻于至善,否则就不是“绿色”的价值趋向,而是价值的异化。臻善刻划了“绿色”的价值本性及其内在趋向。

“生生”、“协变”主要是从存在状态与发展机制层面对“绿色”辩证本性的“事实”性陈述,“臻善”则主要是从价值趋向的视角对“绿色”辩证本性的“价值”性陈述,“生生—协变—臻善”乃是关于“绿色”的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相统一的

“思维中的具体”。“蓬勃的生机、旺盛的活力、绵延的生命—节约、回用、循环—生生、协变、臻善”构成了关于“绿色”的认识从感性直观到知性分析再到理性综合的辩证过程。对这一认识的辩证过程的把握,无疑会推进“绿色”在不同实践领域及相关学科中有针对性的理解和应用。

【参 考 文 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 145.
- [2]康定斯基. 论艺术的精神[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6-61.
- [3]E. 希尔斯. 论传统[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45.
- [4]绿色周刊. 1995(10).
- [5]巴里·康芒纳著. 侯文蕙等译. 封闭的循环[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0、31.
- [6]E. 拉兹洛. 进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32.
- [7]《道德经》,二十五章.
- [8]郭因,黄志斌等著. 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通论[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182.
- [9]转引自徐嵩龄. 环境伦理学进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85.
- [10]汉森·萨克塞. 生态哲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142.
- [11]方东美. 中国人的人生观[M]. 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80. 13、14.
- [12]方东美. 中国人的人生观[M]. 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80, 13、14.
- [13]H. Rolston, Environmental Ethics: Duties to and Values in Natural World, Philadelphia, 1998. 转引自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55.

(责任编辑 袁 瑛)